

#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笔谈

## 做好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何德旭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对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要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决议》的精神实质,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及其各个环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根本路径,是一场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深刻变革,必须积极主动务实地做好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对话和互动,达成管理日常事务、调控资源、履行权利的行动共识以缓解冲突或整合利益、实现公共目标、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结构、过程、关系、程序和规则的体系性活动。<sup>①</sup> 在我国,国家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根本利益和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以行政、立法、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为主体,充分发挥多种社会团体和阶层的积极作用,相机选择和综合运用政治、行政、法律和市场等多重手段,从而形成能够有效回应社会公共需求的制度体系、能力和过程。<sup>②</sup> 从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来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针对一度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问题,

① 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

② 吕炜、靳继东:《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中国财政 70 年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管理世界》2019 年第 9 期。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决议》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仍然需要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善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交换平等、竞争公平、监管有效的市场机制,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激励企业扎实做好技术创新、提高供给质量、降低经济成本、提高竞争力。

二是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宏观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在我国,政府主要承担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sup>①</sup>《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国家发展规划战略的科学性,优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目标、加强合理分工、提高协同效率,做好宏观经济政策的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提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精准性及两者的协调性,加强就业、产业、环保、区域等政策的紧密配合程度,进而在顶层设计上保障高质量发展。<sup>②</sup>

三是努力探索高质量发展规律和模式,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高质量发展是把握发展规律、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sup>③</sup>在倍加珍惜、长期坚持的同时,还要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总结好中国的经济理论,讲好中国的故事,进而到实践中去,指导经济更高质量、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福祉的发展,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 二、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破解高质量发展中的难题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面临的发展质量不高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原因。构建平衡、协调、充分的新发展格局,是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

一是着力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做好国内实体经济、产业、金融、贸易等以及相互之间的大循环,努力推进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坚持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是推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要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鼓励创新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优胜劣汰;支持有核心技术并不断引领创新的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从而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有核心技术并不断结合社会需求进行高质量创新的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成长。通过促进两类经济的协

① 江小涓:《创新管理方式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经济日报》2020年6月2日,第8版。

② 何德旭、苗文龙:《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宏观经济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③ 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4日第06版。

调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激励两类企业自主创新,进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供给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福祉。

三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and 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和提高城乡教育质量;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住房条件。

四是促进区域平衡协调充分发展。《决议》明确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内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五是促进实体经济、实体产业与金融体系平衡协调充分发展。在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下,必须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数量均衡、结构均衡、融合发展;提升金融体系对高质量项目的筛选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抗击风险的韧性,从而更准确、更高效地服务于高质量经济发展;<sup>①</sup>同时,要强化对涉及政策性支持、制度性扶持的实体企业规范经营的监测,控制其利用便利的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在健全金融风险防范法律法规、提高公众投资者风险意识和金融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为企业生产投资和研发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发挥商业银行和市场各自的风险管理优势。

### 三、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的主线,可以为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制度支撑,有助于持续优化经济结构、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我国社会生产力跃升到更高水平打下坚实基础。《决议》明确指出:“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要求,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实现科技创新,需要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有效需求,不断提高产品、服务、创新质量。一是在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层面建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经费管理机制、评价机制,切实落实“揭榜挂帅”、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机制。<sup>②</sup>二是财政要根据企业创新技术水平和研发投入行为,有重点地增加对创新密度较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支出,提高创新速度和技术水平;同时,根据企业创新行为、技术投资率水平和阶段性创新成果进行阶段性扶助,减少创新前期投入、加大创新项目质量验收力度和研发成功后的激励。<sup>③</sup>三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

① 何德旭、苗文龙:《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宏观经济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7 期。

② 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24 日第 06 版。

③ 苗文龙、何德旭、周潮:《企业创新行为差异与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效应》,《经济研究》2019 年第 1 期。

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四是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五是适应数字化趋势,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绿色经济是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的必然形式和普遍形态。《决议》明确指出:“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和有序实现我国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稳步推进绿色经济转型,一是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二是要有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举措,加强全国统筹,完善能耗控制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三是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科学考察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加速新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四是加大对环境气候治理研发的支持,对存量性环保生产问题进行化解,有序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五是深度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院长)

## 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及其成功经验

史 丹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历史进程。新中国工业 70 多年的发展过程,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进,从总结中提高的过程。当前,我国正在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工业强则国家兴,总结我国过去工业化经验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就非常重视发展工业。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就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发展目标。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引。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中央在《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提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

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因为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为农业、轻工业提供必要的设备、燃料、原料和材料,在工业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封锁的环境下,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受到制约。我国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开启工业化进程不同于一般的产业发展顺序,这既是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也是综合国外政治经济形势和我国体制优势在工业化道路上进行的探索和创新。我国在工业化初期实施“以钢为纲”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战略,虽然后来出现冒进问题,但为后来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奠定了基础,仅用短短 20 多年时间,我国就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此外,也可以看出,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制约的发展思想也是我党的光荣传承。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制定了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中国工业因改革开放而进入了快车道,较好地解决了工业发展的“双缺口”问题。一方面通过发展乡镇工业,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数量多、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通过引进外资和扩大进口,增加与人民生活相关的轻工产品与食品的供应,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带动了我国轻工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解决了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改善;通过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我国工业技术装备水平大幅度提升,工业生产技术和国际竞争力有较大的提高,我国的工业发展模式逐步由“三来一补”转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工业生产能力跃升全球第一,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工业外贸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与此同时,我国的比较优势逐步从劳动向资本与技术方向转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对工业发展道路问题再次进行理论创新,明确提出将可持续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之一,工业发展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发展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的道路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我国之所以能够并联式发展,一是我国工业化进程正值全球信息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拥有后发优势;二是拥有体制优势,在资源技术能力有限的条件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目前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已处全球前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建党 100 周年之际,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征程。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是中国人民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是工业强国建设的关键期。党中央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提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稳定制造业占比,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等一系列新时期经济发展纲领。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创新再一次进入高潮,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吸取一些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教训,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坚定发展制造业,提出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路径;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提出国内国外“双循环”新型开放式发展模式;三是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即生态文明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从西柏坡进京之前,毛泽东同志说,这是进京赶考。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我们相信,在建设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党会再次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第二份出色的答卷,创造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世界之林的奇迹。

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与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过去100年来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宝贵财富,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根本保障。

第二,坚持改革开放。过去40年的经验证明,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如果说“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一次伟大的觉醒,那么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又一次伟大觉醒,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的重要一招。在新征程上,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构建要素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的国内统一市场,加快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建设有为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

第三,坚持中国道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是坚持独立自主、树立总体安全观和大历史观的道路。《决议》强调,“只要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四,坚持系统全面规划。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完成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当前正处于“十四五”的开局之年。13个五年规划(计)划对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指引作用,也是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依据。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五年规划(计)划由以经济规划(计)划为主扩展到经济社会环境教育等多个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党中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产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中,要坚持不越过生态红线、坚守环境底线、提升资源利用上线,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增加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一定能实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统筹发展和安全:韧性理论的视角

张晓晶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法的首次出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于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做了全面总结。就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决议》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同形势任务要求相比,我国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决议》强调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

统筹发展与安全,既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也是对交叉理论或跨学科研究提出来的新课题。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主题,在社会学、政治学中也有所涉及;安全问题则更多的是外交领域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关心的主题。长期以来,这两大问题是分开进行研究的,少有交集。由于缺乏较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方法,学者在讨论发展和安全问题的时候,往往各执一端,较难深入。这里笔者尝试从韧性理论角度,将发展和安全置于统一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 一、韧性体现了一个经济体的安全发展能力

韧性与冲击有关。正是因为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韧性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的结果显示,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韧性”一词的搜索量稳步上升,甚至在 2012 年以来,超过了“金融危机”一词。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也催生出《韧性社会》<sup>①</sup>这一类著作。

① Markus Brunnermeier, *The Resilient Society*. Endeavor Literary Press, 2021。该书获得英国《金融时报》2021 年度最佳图书奖。

韧性理论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早期见于物理学、工程学、生态学,后来被引入社会科学乃至公共政策等领域。所谓“韧性”(resilience),原义是指生态系统在遭受某种外界扰动后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后来有学者将其拓展为三个维度,即防御抵抗能力、适应恢复能力和学习转化能力。韧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静态均衡(受到冲击后回归常态或均值),而是演化均衡,即能够在冲击反应后演进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

尽管对于安全的理解各有不同,但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安全可以视作“对一国所追求的发展价值的威胁的消失”。从韧性角度看,对发展的威胁就是一种冲击,威胁消失了,发展就安全无忧了。“发展威胁消失”可以说把握了安全的本质,同时也将安全与发展紧密地关联起来。寻求将威胁发展的各类因素都“消灭”的绝对安全是不现实的。真正的安全发展是在经济体面临外部冲击或威胁的情况下,能够“扛得住”、不会垮掉甚至崩溃,进而在冲击反应后保持体系的演进和发展的可持续。

从这个角度,一个经济体的韧性恰恰体现了该经济体的安全发展能力,增强韧性是实现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的关键。

## 二、韧性理论不排斥随机冲击及其破坏性

从安全角度出发,一切不确定性、随机性、波动性等都可能构成发展的威胁或冲击,因此它们是不好的,是要努力避免的。但从韧性角度出发,就完全是另外一套逻辑:增强韧性并不试图消灭各类冲击或威胁;相反,承认随机性冲击及其破坏性对体系演进和韧性增强的必要性。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随机事件时,就会产生畏惧并反应过度。在逃避这种恐惧以及对秩序的渴求中,一些人类建立的系统往往会打乱事物的隐性逻辑,结果导致“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大自然是管理小概率事件的最好专家,也是管理“黑天鹅”事件的高手。几十亿年来,它成功演化到今天,而无须任何由某个委员会任命的主任给出控制指令。大自然不只是“安全”的,它还能积极地进行破坏和更替、选择及重组。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不断利用(而非逃避)随机事件、不可预测的冲击、压力和波动实现自我再生的机制。大多数研究认为,韧性主要在于受到某种冲击或危机发生后,经济体如何吸收、减轻负面影响,以维护或尽快恢复整体系统的稳定性或所谓“正常状态”的能力。我们认为,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定力和稳定固然重要,但经济体系因为能够“容忍”甚至“鼓励”一定的波动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拒绝它们),不仅可以适度降低经济体系遭受大冲击的概率,防范危机于“未然”,而且能够因为在小冲击的作用下强化自身的能力,亦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仅仅是忙于应对冲击,做出应急反应,而忽略加强自身安全能力建设,特别是通过容纳小波动、减少大冲击来增强韧性是远远不够的。

## 三、韧性理论强调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

一个系统的韧性是能够保证该系统有演化进步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稳定与演化对于系统都是重要的。如果系统没有在冲击下反弹进而获得稳定的能力,也就谈不上后来的演进和发展了。而如果只是关注稳定,不去重视创新、演化特别是系统的进步,那么,这个稳定就会使得系统缺乏活力、竞争力。可能获得了一时的、静态的稳定(安全),但若因此而大大削弱或消灭了演进的能力,在动态意义上,就是非常危险(不安全)的,从而也就谈不上是真正增强了韧性。

一方面,增强韧性的代价从动态角度看是“划算的”。增强韧性是要有投入、要付出代价的。



比如,我们希望增强产业链的韧性,一般就需要通过缓冲库存、结构重复或增加产能来实现。这意味着可能需要牺牲效率来换取更强的韧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都在按照“及时”原则管理生产系统。也就是说,最大化流量和最小化库存,这是全球价值链的目标。相比之下,韧性思维让我们强调“以防万一”,这就需要偏离原来的效率目标。这样的成本投入或者说效率牺牲,只有从动态角度,从增强韧性、保证系统演化创新的角度,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韧性思维提供了一种看待成本收益计算的新方法。这同样适用于安全-发展的权衡。安全作为一种公共品,也是需要投入甚至大规模投入的。强调安全维度意味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效率原则,施策结果将偏离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均衡。比如面对技术封锁和技术脱钩的风险,我们势必要搞备胎战略,推进产业链的多元化、本土化、区域化,以及强链补链,这些举措从国际分工与全球资源配置角度,并不一定符合效率与市场原则,但从长远来看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是“划算的”。

另一方面,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在能力建设消除安全隐患。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充分体现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基础不牢,发展的根基就会动摇。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发展,国家安全最终也得不到保障。发展和安全可谓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眼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安全发展,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行稳致远。因此,必须坚持办好自己的事,立足国内高质量发展,以不断壮大的综合实力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坚强的物质支撑,实现主动安全、动态安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也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遵循。稳(安全)是前提,进(发展)是目标;稳方能进,进才能稳,就如自行车一样,在行进中才能保持平衡。因此,发展是最大的安全。真正的安全保障在于发展,在于自身的能力建设,在于经济体韧性的增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追求完全没有危险和内外威胁的绝对安全状态,因为那样代价太大,甚至会扭曲和阻碍正常的发展。

#### 四、制度韧性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

韧性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已经运用到很多方面。比如,社会韧性、经济韧性、金融韧性、产业链与供应链韧性、城市韧性等。但就一个国家而言,最根本的安全保障是制度韧性。增强制度韧性,关键在两条:一是开放,二是包容。

制度的开放性。从传统安全理论来看,开放会带来风险和安全挑战。柏拉图等早期思想家认为,安全仅存在于封闭的社会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当中,处在经济相互依存的社会就会有风险。但从全球化演进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更安全。根据“熵定律”,开放系统将导致有序并产生新的活力,封闭系统会导致无序而走向死亡。封闭一般会形成暂时的稳定,一种静态的安全。但从动态角度来看,由于封闭导致制度僵化与社会惰性,最终会引致系统走向动荡甚至崩溃。开放就是要破除各种偏见和歧视、门槛与障碍,让不同文明相互借鉴,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各类资源要素顺畅流动;在比较中发现落差,以落差促进要素流动,从而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开放发展必然面临开放竞争。开放竞争不仅仅包括国别之间的经济金融竞争、科技竞争,更会有制度竞争。从全球范围来看,制度的竞争以及为获得制度优势而衍生的改革竞争将是一种常态。而开放竞争是推动制度改革、保持制度活力、增强制度韧性的内生动力所在。

制度的包容性。包容性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从韧性角度来看,个体的韧性是整体社会韧性的基础。社会差距与不平等的扩大,往往会使得一部分社会群体(个体)韧性不足,难以应对外部冲击:暂时性的失业可能导致永久性失业,公司可能永远关闭,巨额债务可能使家庭停滞数年。包容性制度就是要公平地给予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建设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机会,提高社会流动性,健全社会安全网,激发各阶层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的繁荣发展。

总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开放包容增强制度韧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积累存量财富、增强经济实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是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各类风险挑战的基本方略,是实现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的行动指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形成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杨开忠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出的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之举,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塑造世界经济新秩序具有十分深远的重大影响,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时代、新征程经济建设中起纲举目张的作用,要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贯彻。

### 一、新发展格局“新”在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对新发展格局“新”在哪里提出不同的观点。绝大多数文献认为,新发展格局“新”在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其中一种极端倾向甚至认为新发展格局是逆全球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式“脱钩”战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敢能苟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外双循环主次随具体历史条件而变化。从对外贸易增速与经济增速关系来讲,20世纪50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封锁威胁下,我国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双循环以中苏国际大循环为主导;20世纪60年代我国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封锁中,经济建设以备战为目的,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20世纪70年代初至2007年,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的封锁解除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双循环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2008年以来,随着内需不断成长和国际环境变化,双循环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导。因此,新一轮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延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因此,中国式“脱钩”论不仅与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事实不符,而且相悖于新发展阶段推动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战略。新发展格局之“新”不在内外循环谁主谁次的问题。

有文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自主创新驱动的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突破“依附性”、具有“替代性”的经济现代化新模式。这种认识虽然包含新发展格局的自立自强本质特征,但未能揭示新发展格局所固有的根本属性,从而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给出新发展阶段“自立自强”不同于传统“自力更生”的经济本质。笔者以为,新发展格局本身固有的根本的属性就是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其中包括全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新发展格局“新”在包括全球资源整合创新能力在内的强大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就是形成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相结合的世界里,没有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就不能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从而不能有效地实现经济循环自立自强。

## 二、形成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新发展阶段必由之路

获取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既是实现全面现代化、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大国履行自身使命和责任的需要,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

第一,这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世界体系来看,国家现代化就是一个从被支配的边缘地带到支配的核心地带的转变过程,在经济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获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过程。小国因规模小,这一过程一般不会带来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大国的这一过程最初也不会带来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然而,当大国现代化达到一定水平时,进一步现代化就势必带来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我国规模超大,经过百年奋斗,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现代化新征程,消费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调整,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加速形成。这意味着,随着全面现代化,新发展阶段必然会形成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事实上,我国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正在成为世界大变局的主动力量,必须主动适应变化,加快建设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第二,这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必然之举。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的关键时期,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全面重组,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从欧美向亚洲的转移,美国持续加大对我国从世界财富生产国转变成为世界财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心国的打压阻遏力度,全球互动空前复杂多变,充满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为在世界大变局惊涛骇浪中不断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影响力、持续力,必须顺势而为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建设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第三,这是负责任大国履行自身使命和责任的客观需要。中国是一个历史超悠久、人口规模超大、幅员广大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其进一步全面现代化和复兴不仅关系中华民族,而且关乎人类命运,在全球肩负特殊使命和责任。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就不能更好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并有效履行肩负的特殊使命和责任。

### 三、提高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要发挥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引领作用

新发展阶段必须保持顽强斗志和战略定力,打好建设强大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攻坚战、持久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建设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要着力从“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在哪里生产、谁以及按什么规则和程序决策”五个基本方面推进。从“为谁生产”看,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以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为路径,建设全球商品定价、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心。从“生产什么”看,要坚持畅通经济循环是关键,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不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和国际竞争力,吸引和集聚合意的全球资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加快从“世界工厂”向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心、金融中心以及全球运筹管理中心转变的进程。从“怎样生产”看,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人才、教育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建成全球科技、人才、教育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从“在哪里生产”看,要顺应国内人口和经济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集聚,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体系;要顺应世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以及从北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趋势,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积极融入 RCEP 和 CPTTP。从“谁以及按什么规则和程序决策”看,要坚持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运用改革开放的思维和办法,扫除畅通双循环的观念、制度、技术和利益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全球城市(Global City)和世界级城市群是双循环结合的中枢,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生产中心,是获取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动力源和增长极。因此,建设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全球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具有强大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20 世纪 90 年代初和 21 世纪前十年,我国开始把“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作为头部城市和头部城市群发展的愿景和目标。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系统部署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等全球城市及以此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并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取得巨大进步。以全球城市为例,根据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我国大陆全球二线及以上的城市,2000 年只有上海、北京,2012 年也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但到 2020 年迅速增长到 17 个,居世界首位,其中,全球一线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然而,全球城市虽然数量上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比较薄弱、发展质量还不高。因此,为获取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应更加重视全球城市高质量发展,按照“十四五”和 2035 年远景目标规划要求,以扩大再生产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为核心,强化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加快打造引领新发展格局的第一梯队。

(作者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 在百年奋斗史中寻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秘诀

刘元春

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掌握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秘诀,无疑就掌握了中国经济学的内核。20 多年来,大量经济学人一直试图从产权改革、硬约束、比较优势、强政府、晋升竞标赛、财政分权等角度来寻找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但事实证明,大量的理论探索基本局限于单一的理论逻辑,不仅难以全面展现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历史实践,同时也难以构建出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奇迹在其持续繁荣和迈向现代化新征程中不仅没有证实这些理论猜想,反而对过去很多理论假说进行了全面的证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快速发展的奇迹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也不是某种单一逻辑在中国实践的展现,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在一个历史过程中抓住历史机遇的智慧结晶。因此,我们需要以系统的、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奇迹的秘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系统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百年党史的大历史观角度成功地找到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答案。这些答案不仅包含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同时也包含我们延续中国经济奇迹,使中国经济奇迹在更加辉煌中全面实现民族复兴初心使命的密码。它所总结的历史经验不仅解释了中国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经验,同时也解释了中国经济社会基础、上层建筑持续良性演变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因此,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正确的唯物史观和党史观,从百年党史的角度来深入探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是我们寻找到中国经济学内核的关键。

## 一、从百年党史的全时段中寻找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

首先,我们不能割裂百年党史,简单地从改革开放史来寻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秘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历史的直接产物,更是中华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接续奋斗一百年的产物。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经济奇迹产生打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和坚实的政党基础。没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党的基本方针和路线。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斗,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将平等根植于制度和文化之中,彻



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一化三改”,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大量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失败,很重要的就是在改革开放前夕共产党的领导弱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崩塌,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秩序的崩溃,导致国家和政党无法为改革提供稳定科学的顶层设计、改革所必需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品。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推进的各种建设工程为改革开放提供充足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各种红利、形成改革良性的路径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精神基础。一是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构建中国初步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创造了基本供给基础;二是教育普及取得革命性变化,基础教育得到全面发展,到 1980 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在 90% 以上,成人识字率已达 69%,明显高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本;三是科学技术得到系统性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使发展和安全得到有效统筹。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直接为中国经济二元转型、中国经济开放提供了完备的产业基础、技术基础、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基础,从而为中国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提供了先决条件,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中出现本国生产体系崩溃、市场秩序混乱、难以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构建参与国际竞争的有效竞争力的困境。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展开的伟大历史进程是破解中国经济奇迹秘诀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开花结果的载体。中国取得改革开放伟大胜利的密码就是中国经济奇迹创造的秘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陆续展开了以下几大方面工作:一是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确立路线方针政策,为改革开放确定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二是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思想基础;三是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大胆进行实践创新,抛弃各种教条,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四是制定了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基本的战略框架和实施路径,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既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又坚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确保了改革开放行稳致远;五是设计出合理的改革路径,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陆,先实体后金融,在改革中推进开放,在开放中推进改革,从而保证了渐进改革的有序推进;六是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契机,有序推动体制转轨、结构转型与战略转换有机协调,创造出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改革红利,形成以增量改革为主、以增长为导向的激励相容的改革动力机制;七是进行全面的政府改革,在打造强政府的同时强化政府的竞争和法治约束,避免渐进改革容易带来的政治机会主义。正是这些多元举措,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成功实现了中国经济奇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此进行了深刻总结: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功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充分证明了中国模式不仅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同时也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进一步深化,使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的伟大经验不仅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传统秘诀,同时进一步证伪各种西方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一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二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三是针对新时代面临的各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提出“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等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做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等重大决策,使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四是明确指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求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问题导向,聚焦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激发人民的首创精神,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走实走深。五是进一步推进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六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这些战略举措是中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的保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产物,与传统学者利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开出中国药方具有巨大的差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和延续中国经济奇迹的理论密码,是证伪西方各种理论假说最好的理论遵循。

## 二、从百年党史经验中多维度寻找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不仅从历史维度分4个阶段对我党百年伟大实践创新和理论创

新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也从5个方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从10个方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包含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秘诀,蕴含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目标顺利完成、必将全面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密码,当然也就包含了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秘诀”。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政治秘诀。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转型与改革历史进行对比,改革开放最为根本的启示就是,任何改革和调整都必须要有强大稳固的改革者、持续有效的制度供给者和稳定有序的政治社会环境,改革引发政治环境动荡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必定导致经济与政治的恶性循环。不断自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持续稳定执政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前提,也是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种制度优势在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上不仅仅表现为党的执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党通过各种战略规划的设计和顶层设计,成功克服了传统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克服了渐进改革中必然出现的机会主义,从而避免中国改革与发展陷入拉美陷阱之中。“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各种挑战和困难之时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活力,避免步入教条化困境。

二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价值秘诀。改革为了谁,发展为了谁,这个价值终极问题不仅决定了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分配模式,同时也决定了改革发展的模式选择和路径设计,决定了改革与发展的可持续动力机制。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经济增长的奇迹,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胸怀天下”。这种价值观要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同时这种价值观也要求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这种价值观就会极大地调动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大大消除由利益分配所带来的各种冲突和摩擦,从而为资源配置的改善形成激励相容的内生动力体系。

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坚持稳中求进”是中国奇迹产生的理论与方法密码。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来源于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和立场的基础上,不断根据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发展规律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期间最大的体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道路进行了科学谋划,成功破除了对“华盛顿共识”的迷信,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了有机结合,成功实现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最大的方法论就是坚持“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和“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

四是“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

放”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产生的道路与模式密码。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我们首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拨乱反正,果敢进行改革开放,坚定进行计划经济体系改革,果敢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侵蚀,抛弃了“华盛顿共识”给予的药方,成功走出了一条渐进改革之路,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创举。在具体举措上,我们在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过程中始终坚持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和完善,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提升本国的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在宏观道路设计上坚持社会主义的属性毫不动摇,在微观体系上坚持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相统一,有效实现了宏观效率与微观活力的有机统一,人类理想与中国特色的有机协调。在这种模式和道路之中,持续改革和进一步开放将是其内生体系的必然产物。这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奇迹必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实现伟大的持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制度密码。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完成了全人类制度创新史上最伟大的创举。这些创举不仅仅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突破了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的基础性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进程中成功克服了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动态有效与静态有效、宏观稳定与微观活力、逆周期与跨周期等传统二分法的理论困境。这些理论突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新发展格局战略布局中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中国制度在资源配置上的显著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全面展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经济建设:坚持中国道路

杨志勇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从十个方面阐述了这些历史经验,其中之一是坚持中国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最初效仿苏联,走“城市包围农村”的夺取政权之路。这条道路探索中的挫折,让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立足国情,中国共产党人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因此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在经济工作中更是坚持中国道路,克服了各种困难,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辉煌成就。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坚持中国道路,正阔步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让经济建设前进的道路更加宽广。

##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建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计划经济体制,一路披荆斩棘,建成基本独立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在成立后用很短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进入“一五”计划时期。在“一五”时期,中国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苏联援建的 156 个工业重点项目建设,奠定了新中国工业的基础。计划经济体制在特定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支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计划手段对于资金稀缺国家集中资金办大事有优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通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宏观经济稳定道路。

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形式在实施中也不断变化。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一报告内容丰富,其中与经济相关的六大关系分别是: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经济体制的探索过程。这些关系的处理均立足国情,抓住矛盾问题的主要方面,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计划经济体制在探索中也遭遇挫折,各种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激活。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易大起大落,最终导致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受封闭经济的影响,中国未能充分享受全球经济分工所带来的收益。

认识决定高度,同时认识能否有效转化为实践,还需要国内外各种条件的配合,但中国共产党人对实践的探索不停止。条件一旦具备,改革开放就开始起步,党的中心工作也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选择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市场活力不断地得到释放。经济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走出一条管用的道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每一个概念的提出及相互之间关系的界定,都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经济改革的积极探索。中国经济奇迹因此出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味着需要改革原有的经济体制。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营企业改革等渐次推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催生非公有制经济经营主体。更多的经营主体,更加灵活的经营机制,更加完善的经营环境,中国经济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正轨。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后,随着 1994 年以来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国有企业等多个经济领域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得以形成,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选择并不容易。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经济改革的依据,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寻找可供参考的道路;从西方国家市场运行机制中寻找可供借鉴之处,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那里得到技术援助。没有哪一种理论和实践做法未经改变,就可以直接用于中国。事实是,中国摆脱理论的僵化理解,综

合借鉴各国做法,立足国情,经济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才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市场化改革才真正摆脱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

经济建设并非一帆风顺。1993 年和 1994 年,面对经济过热、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党中央及时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决策,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国经受住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党驾驭经济的能力再次得到充分证明。党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定后市场型财政政策的首次实施。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进入人均 GDP 从 1000 美元向 3000 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既是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2003 年抗击“非典”反映出中国快速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严重,而且这不是局部现象,需要从全局的、战略的,甚至是政治的高度上来思考解决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的成功与对外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加入 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国经受住世界市场的挑战,抓住全面参与世界经济的机遇,越来越习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发展中国经济,与全球共享红利。2008 年经济形势复杂,中国宏观调控从“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转向“一保一控”(保增长、抑通胀),再转向“保增长、扩内需”。这一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及时对宏观经济政策作重大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视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从而促进和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 三、新时代经济建设道路的选择

2012 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已有所下降,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重视量的增长到更加重视质的提升,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所组成的新发展理念。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建设上做了许多过去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所涉及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哪一项任务的落实都不容易,但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用自我革命的精神,努力去完成任务,让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经过努力,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加清新,污染防治攻坚战已取得重大进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在持续推进中。

在经济领域,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扎实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



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是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重大风险的重要举措。中国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在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金融风险等取得进展。统筹安全与发展,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让中国经济遇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为艰难的挑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一方面抓疫情防控,一方面抓经济发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目标。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2%,是这一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中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大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大国,中国有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条件,这符合大国经济发展规律,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选择。同时,中国绝不封闭自己,而是坚持对外开放,国门越开越大。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前进的道路不可能平坦,中国仍然需要应对各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有的已经到来,有的需要未雨绸缪。中国必须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的解决为导向,不断提高驾驭经济的能力,适应数字经济、转型社会、全球经济治理等多方面的挑战,走出一条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经济建设道路。

#### 四、新时代经济建设中的三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 (一)实现共同富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sup>①</sup>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动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需要正确处理好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关系,一方面要鼓励创造财富,另一方面要防止两极分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按劳分配的效果如何与就业密切相关。为此,需要强化就业优先导向,让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分配的调节,应各就其位,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领域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按此要求,“提低”“扩中”的任务压力仍然较大。社保、转移支付应该在“提低”中发挥重要作用,应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相应的保障标准,让社会共享发展的红利。税收制度可以在“扩中”上发力。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不能以静态的标准来衡量,应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个人所得税制度可通过税档和级距优化,让中等收入群体更快成长。对于超高收入群体(如收入在前0.5%或1%的群体)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设定在较高的水平上,以体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对于灰黑色收入,则应区分收入来源,通过罚款、没收等形式,通过非法手段致富的,应通过没收、罚款、罚金等方式予以调节,促进收入机会的均等。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改善公共服务,不仅可以让人民享受到更多的精神财富,而且可以减少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好地促进共同

<sup>①</sup> 本文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新华社2021年12月11日电。



富裕目标的实现。

实现共同富裕也离不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财富水平的增长,愿意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和社会群体越来越多,公益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应作进一步优化,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阻碍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其他障碍也应一一拆除。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富裕,而且包括精神财富的富裕。在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精神财富层面的富裕问题会变得更加重要。从政策面上,要注意文化等方面的投入,让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内涵更加丰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所有公共政策都是有成本的,政策的实施要考虑财力约束因素,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同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同公平状况说明实现共同富裕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必须立足国情,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 (二)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

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行为不能没有章法,否则消极作用就可能大于积极作用,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

资本行为有规律,要在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的基础上,认识和把握其行为规律。资本本性是逐利,逐利本无可厚非,但应遵守市场规则,应在合理的市场秩序下进行。为此,要对资本逐利行为加以引导。

随着数字经济等新经济的兴起,资本行为规律似乎有了变化。实际上,资本特性没有变化,资本行为规律也没有根本性变化,但由于资本行为的实施条件发生了变化,资本行为的经济社会影响放大,资本行为所依赖的平台经济“赢者通吃”趋势越发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资本行为的有效监管。要对资本行为方式有更密切的跟踪,充分把握资本行为模式,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管,既不影响资本合规合法运作,又不让资本的消极作用扩散;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平台经济的发展让平台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即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具有很强的外溢性。平台建设如果一开始是资本投入的结果,那么资本运行就需要成本的补偿,就会要求对平台的使用收费。平台收费高低以及垄断性质的界定都存在不少争议。收费低,平台可能无法运行;收费高,平台可能会受社会责难。平台还要面对阶段性问题。在平台建设的初始阶段,平台或通过低收费赢得市场竞争优势,但接下来就需要高收费来补偿资本投入,而当平台投入的资本得到充分补偿之后,平台运行的变动成本很低或接近于零,这时平台运行只要较低的收费就可以做到,但商业平台有盈利诉求。无论何时,从商业视角看,商业平台都有高收费的潜在愿望。这就需要直面平台的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矛盾,在平台经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寻找较好的均衡点。

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共性,也有个性。国有资本的参与可能表现出与私人资本不同的特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不同,从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目标出发,中国需要健全符合自身特色的资本监管模式,走出一条中国道路。

## (三)金融风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重大风险。压实地方、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等各方责任,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这是非常正确的决策。风险与收益应该相称,唯有如此,市场经济才能有序运行。

市场经济的成长和成熟过程,是市场秩序不断规范的过程。大型企业风险极容易转化为金融

风险。防范金融风险,一大着力点就是防范大企业风险。有限责任公司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不是帮助企业逃避责任的制度安排。有限公司的股东只就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但是企业责任及相关利益主体的责任需要进一步厘清。现实中,一些公司通过不规范运作,转移企业资金、业务收入和利润,抬高企业成本,掏空企业,让企业资不抵债。像这样的企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就绝不是公司一破产就可以了之的。

公司有限责任的前提是企业遵纪守法和正当经营。企业不规范运作,让企业利益受损,首先应该回溯相关责任方的责任。这里涉及的不仅仅包括企业外部债权人的权益,还有企业自身的权益和股东权益。企业有责任保护企业自身的资产,维护企业自身的权益,收回本应归属企业的资产权益。那些被各种资金转移所侵蚀的“空心化”企业,变成空壳公司,所进行的非规范运作,不外乎通过复杂程度不一的关联交易,导致企业实力大降,有的企业甚至走到破产边缘。

企业规模越大,问题越多,处理起来越不容易。“大而不倒”本为防范金融风险及相关的社会风险的选择,但某些不规范经营的大公司将之视为“护身符”。长此以往,经济领域的软预算约束就会蔓延开来,经济就会失去活力。有的大企业散布舆论,认为企业破产会有这样那样的大风险,却忘记反思企业经营成这样的自身原因。压实企业的责任,要不为企业破产“舆论”所主导。冤有头,债有主,企业责任不只是作为法人的企业之责任,更是企业的经营者、实际控制人以及企业相关利益者的责任。要厘清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企业风险,并据以决策。

强调企业自救的主体责任,是因为企业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最直接的责任人就是企业,企业自救的主体责任即使在有其他力量支持的条件下也不能减少。风险与收益必须相称,唯有如此,各种市场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形成,软预算约束问题才能解决。行业主管对本行业状况有更多的专业信息,可以利用信息优势以及主管的地位,对本行业的风险进行预警,对本行业的风险防范化解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方案。对于行业主管应履职却未履职的,也要有相应的惩罚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监管一方面要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促进金融稳定。金融监管是否到位,与金融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是否规范,有密切关系。金融问题不仅是金融行业的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在金融行业的集中体现。金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未用好金融,结果可能放大经济风险。用更有效的办法处置金融风险,尽可能减少金融风险,减少经济社会损失,同时,健康的金融业可以更好地服务经济。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是现代金融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监管能力,金融机关的责任才有更坚实的专业保障。

化解金融风险要有充足的资源。充足的资源,意味着相关各方要统筹资源,统一释放财力。就地方责任来说,重要的是利用好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让地方资产更多地服务风险防范化解,而不能将责任上移。各地的风险如能做到自己承担,中央就可以集中精力去做更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大事。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所拥有的资源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统筹资源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上还有一定空间。这些都要求中国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防范化解风险的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博 阅